

周易辨原

黄天骥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黄天骥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周易辨原 / 黄天骥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
2008. 12

ISBN 978 - 7 - 218 - 06051 - 4

I. 周… II. 黄… III. 周易—研究 IV. 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91427 号

责任编辑	陈海烈
整体设计	张竹媛
责任技编	周 杰
出版发行	广东人民出版社
印 刷	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开 本	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
印 张	21.25
插 页	2
字 数	500 千字
版 次	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218 - 06051 - 4
定 价	48.00 元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【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gdpqh.com> 电子邮箱: sales@gdpqh.com

图书营销中心: 020-37579604 37579695】

序

董上德

“我又写完了一卦!”

“今天已经写到第六十三卦了。”

近一两年，我和天骥师在晚饭后散步时，经常听到他讲述当天的写作情况。《周易辨原》一书，就是这样一卦一卦地写出来的。

这本书的写作缘起，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90年代。天骥师为博士生开设“古代典籍选读”课程，精读过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论语》，也逐字逐句地释读过《周易》。对于《周易》，天骥师别有会心，每每有一得之见，备课时写在书上，课间讨论，偶有生发，也随手笔录，愈积愈多，稍具规模。有时候，道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发前人所未发，那一种兴奋劲儿难以掩饰；有时候，反复思量，瞻前顾后，未免犹豫再三，战战兢兢。一晃多年过去，热处理之后冷处理，冷处理之后又热处理，天骥师找到了切入口，静下心来，以古稀之年安坐在电脑之前，凝视着屏幕上跳出来的一个个方块字，然后选字、换字，组成句子、构成段落，还要时不时地左查查，右翻翻，找字源，注出处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书是一卦一卦地写出来了，可天骥师并没有像过去的一些学者那样把每一卦的爻辞做分割处理。他注意到每一卦的六首爻辞其实是互有关联的，不可切割的；它们写的是同一件事，环绕着的是同一个题旨。于是，试着理顺卦辞、爻辞的原意，再分析〔彖辞〕、〔象辞〕的相关阐述。换言之，天骥师有一个



核心观念，每一卦都关涉上古社会生活的某一种具体情境，卦辞、爻辞的原初意义都具有“情境性”，它们本来是古代人民生活和社会状态的历史记录。笼括来看，如果说，每一卦所反映的社会情景都只是一些“碎片”的话，那么，做一番“整合”的功夫，可以看到，卦辞、爻辞所涉及的“情境”有：狩猎和畜牧生活、天灾境况、祭祀活动、村落生活细节及上古婚俗、社会管制与战乱事件等。卦辞、爻辞用语简括，可透过简括的用语，回归其“原初”的语境，寻找这些简括用语背后的意象，用联系的观点，用“情境思维”，用考古研究成果，把多种“碎片”黏合起来，却也能发现，《周易》并非如某些人所阐释的那么“玄”：掌握住其“情境性”，说不定会有切实而有趣的解读效果，《周易》简奥的文本与我们的距离也就拉近了。《周易辨原》所要“辨”的“原”，似可作如是观。

其实，对于《周易》，如果我们跳出“义理派”与“象数派”两军对垒的易学史格局，追寻前人值得借鉴的解《易》思路，可以说，“辨原”的路数也是渊源有自，不是横空而出。

我们今天说的“情境”，大略与古人所说的“象”相近，“象”就是具象、物象，是物理性的，而非精神性的。“象”与“义”，究竟孰先孰后？宋叶适认为“六十四卦皆因其象以成理”（《习学记言·周易四》），主“义出于象”之说，刚好与三国时王弼的“象之所生，生于义”（《周易注·乾》）的说法相反。叶适还说：“物之所在，道则在焉。”（《习学记言·皇朝文鉴一》）强调抽象的“道”是源于具象的“物”的。清王夫之说得更为明晓：“天下无象外之道”；“《诗》之比兴，《书》之政事，《春秋》之名分，《礼》之仪，《乐》之律，莫非象也。而《易》统会其理”。于是，“天下有象，而圣人有《易》”（《周易外传·系辞下传》）。清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易教上》开篇即道：“六经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；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。”先哲已经揭示，抽象的道理、意义，不可能脱离“事”、脱离“象”而产生；这些有头脑的学者在解读《周易》时已经初步

有了“联系”的观点。当然，不一定要给他们贴上“唯物”的标签，但他们有“实事求是”的治学精神，却是毋庸置疑的。及至近现代，郭沫若先生著《〈周易〉时代的社会生活》等，那是比较自觉地用“唯物”的观点来看待《周易》的；李镜池先生著《〈周易〉筮辞考》等，也注意到“卦爻辞中的故事”。这些研究，比古代先哲的著述更推进了一步，将“象”的内涵与社会生活史密切联系起来，在“还原”《周易》的社会情境方面为后人开了先路。

天骥师著《周易辨原》，其学术思路可与上述学者“接轨”，而其“情境意识”、“情境思维”则更为自觉，因而对某些传统的理解更具颠覆性。翻开这一本书，可以看到，一个一个上古时代的生活“碎片”，原来是那么富于生活气息，原来是那么俚俗，原来是那么惊心动魄的。可在这些折射着初民人生悲欢的“碎片”背后，古人也在寻找着生存的智慧以及应对各种各样的人生困境的方法。从具象到抽象，从有“故事”的画面去领悟或腥风血雨，或野外欢愉，或人兽杂处的“画外之音”。了解其“画外音”，则可以或浅或深地理解《周易》的“义理”。

犹记得不久前的一天，天骥师打来电话，说《周易辨原》的清样已经校改一遍，卷首的“序”还“空”着，有意让我来“填”上去。我向来胆小，却不知为何，竟然胆大，当即受命。古人于“序”，诚惶诚恐，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里曾经表达过有关思虑。不过，天骥师以平常心读《易》，我又何妨以平常语为《周易辨原》的缘起说几句“略知一二”的话呢？越俎代庖之讥，自不能免；及门学徒信口开河，本是师门之内可以允许的日常“功课”。

不知天骥师以为然否？

2008年4月18日于中山大学

绪 论

我为什么要研读《周易》

人们说《周易》是一部“天书”。因为，它是古人占筮之书，是用来与上天沟通的书；其次，它文字古奥，艰涩难解。在这意义上，说它是“天书”，也未尝不可。

不过，世上的事，有时奇妙得很，人们以为它深不可测，其实一捅就破。被视为“天书”的《周易》，也可以作如是观。如果把它破译，我们将可知道它并不神秘，将可看到它是上古人间一幅幅生动的图景，看到它闪耀着东方的智慧之光。

我在中山大学一向以从事中国古代戏曲、诗词的科研教学为主，近来竟鼓捣起《周易》来。有些朋友与我开玩笑说：这不是“破门而出”吗？我知道，这话的潜台词，是说我有点不知深浅的意思。

我动起研读《周易》的念头，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。那时，我和几位研究生每周举行一次戏曲问题的研讨会。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同学们对元典比较生疏，于是发起狠心，让大家在课时中逐篇细读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，后来又读《周易》；至于有关古代戏曲学科的专业性问题，则随时与我个别切磋。如此数年，同学们觉得基础加固，眼界开阔，颇有所获。记得黄修己教授让他所指导的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，也来参加研讨。课堂上互相问难，其乐融融。同学们觉得我对《周易》的理解，可成一说，纷纷鼓励我把意见整理出



来。后来诸事繁冗，写了一些，又搁下了。去年，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陈海烈先生来舍，我偶然谈起对《周易》的看法，海烈大感兴趣，促我继续命笔。我便余勇可贾，勉力成书。

其实，学习人文科学的学者，门槛不宜过窄。当然，现代的教育，把文、史、哲划分为三个学科，在一级学科中，再分中、外、古、今等二级；二级中又细分为诗、文、曲、论等诸如此类的三级。这样的做法，对强调学科的专业性、系统性，自然也有可取的一面，它对要求不同专业的学者锻炼出不同的思维方式确有一定的成效。但是，文、史、哲本是同源，前人所说的“文”，其实包含了文史哲；而且，哲学家注重的逻辑思维和推演能力，和文学家注重的形象思维和表现能力，在人的头脑中，本来就没有明显区分的界线。举例来说，研究历史的学者，除了要严谨地考证典籍以外，难道能离开对历史现象的感悟和描绘吗？而研究文学理论的学者，更需兼具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，否则，寸步难行，遑论成“家”？

老一辈的人文学者，多属文史哲兼通。以曾在中山大学工作过的师长为例，陈寅恪教授“以诗证史”，他的格律诗写得沉雄隽永；刘节教授治史，却又与学生讲《易》；金应熙教授既精通中外历史，又能把白居易的诗倒背如流；江静波教授是生物学家，也发表了颇得好评的长篇小说。在与我同辈的学者中，姜伯勤教授是敦煌学专家，又熟谙中外美术。蔡鸿生教授则无论是史学著作，还是短篇杂文，都写得意态飞扬。至于我的老师詹安泰、王季思、董每戡等教授，也都淹通文史，既是理论研究校勘注释的权威，又在戏剧、诗词、散文等创作方面卓有建树。前辈师长在学术上的成就，我自然不能望其背脊，但榜样在前，昭示真谛，说明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，应该也有可能把文史哲融会贯通，铸于一炉。

其实，我国的学术传统，从来是既注重学有专攻，又注重各个学科之间的沟通的。只是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强调“一边倒”，按照前苏联教育模式，把人文学科划分得小而小，岂止把

文史哲截然分开，连在中文系内部也规定只能搞理论、评论，而不能搞创作，否则便被视为“专业思想不稳固”，要受到严厉的批判。而从事文学史教学的老师，则各搞一段，你研究先秦文学，我研究明清小说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。这做法，实在是画地为牢，自我作茧。门槛弄得窄而又窄，结果也必然影响学者的视野，制约学科的发展。流毒至今，后患无穷。

我在上世纪50年代初，在“一边倒”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进入中山大学。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，自然成了惯于在狭窄的门缝中讨生活的“患者”。学养的不足，眼界的狭浅，每当和墨搦笔，总是左支右绌。前车可鉴，自当亡羊补牢。因此，我觉得应让后一辈有志于从事人文科学工作的研究生，把学科的门槛开得宽阔一些，于是就有了让戏曲史研究生首先读“经”的做法。

在和同学们一起研读《周易》之际，我重温元典，竟发现了一些过去自己未曾留意的问题。2006年，我和康保成同学一起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“十五”规划重点项目《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》，有空隙能够腾出手来，于是余勇可贾，写成这本《周易辨原》。

这几年，研究《周易》，俨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书报摊上摆着一本本《易》与占卜之类的书，或美其名为“预测未来学”。当人类能够进入宇宙探索奥秘的时代，竟然还有人相信把“乾、坤、震、坎”之类的符号颠来倒去，便能预知休咎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悲剧。其实，把《易》与谶纬迷信扯在一起的做法，古已有之。如今沉渣泛起，这里且不说它。

不过，即使以严肃的态度研究《周易》，也还存在许多问题。由于《周易》成书年代久远，文字古奥简略，这给读者带来了许多索解的困难。而我国历代注《易》的学者，或以玄学眼光看《易》，或只着眼于片言只字的训诂。于是断章取义者有之，望文生义者有之。即或旁征博引，而与《易》的原意相去



甚远。正如王弼所说：“一失其原，巧愈弥甚。”^①而注释的繁烦玄虚，又给那些把《周易》神秘化、谶纬化的学妖，打开了方便之门。于是，原是古代人民生活、社会记录，并抽绎出具有哲理意义的《周易》，在学术史上遭遇了无妄之灾。

在研读《周易》时，前贤和时贤的许多精义，给了我许多启发。我既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一些成果，但又觉得，学者多把《周易》每卦的爻辞，分割处理，没有注意每卦的爻辞与爻辞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。

换言之，没有注意每卦的六首爻辞，写的都是同一件事，环绕着的是同一题旨。这一来，实在也无法辨明《周易》的原义。因此，我试着首先理顺卦辞、爻辞的原意，再分析〔彖辞〕、〔象辞〕对它的阐述，希望对《周易》最主要的部分，有一个符合逻辑的新认识。

《周易》确不易读懂，我不知深浅地把自己的想法整理出来，意在引起读者的兴趣。也希望抛砖引玉，在“易学”的研究中聊添一说。

何谓《周易》

《周易》是我们的老祖宗用作占筮之书，那是不用怀疑的。

在上古，生产力低下，人们对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无法解释，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掌握，当他们遇上了难题，便通过巫卜，求教于上苍。那沟通天上和人间思想的工具，就是龟壳、蓍草，以及用符号、文字来解释上苍意志的《易》。古人以为，通过虔诚的祈祷，利用几个符号如此这般的摆弄，就能知过去未来，就能够避凶趋吉，说穿了，这不过是人们处于茫然状态中，希望得到心灵的某种抚慰。老祖宗的心理，我们可以理解；但若

^① 王弼著、楼宇烈校释：《王弼集校释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609页。

说通过卜筮就能够解释未知之数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不过，研究作为古代占筮之书的《周易》，在今天，却是必要的。因为，透过它所记录的符号和文字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状态，追寻我国文化传统的源头。人们把《周易》视为群经之首，这也是有道理的。

这一部占筮之书，为什么被称之为《周易》？对此，学者们历来有不同的解释。

先说“周”。认为周指周朝，最有代表性的是孔颖达的意见，他在《周易正义》卷首说：“案《世谱》等群书，神农一曰连山氏，亦曰列山氏，黄帝一曰归藏氏，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，则周易称周，取岐阳地名。毛诗云‘周原膃膃’是也。又文王作‘易’之时，正在羑里，周德未兴，犹是殷世也，故题周则于殷。以此文王所演，故谓之《周易》，其犹《周书》、《周礼》题周以别余代。故《易纬》曰：‘因代以题周’是也。”按照他的说法，《周易》即是周朝的《易》的专称。此说也多为后世学者所认同。

至于“易”，也大致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意见：

(1) 认为“易”是占筮之官。因为《礼记·祭义》载：“昔者圣人达阴阳天地之情，立以为易，易抱龟南面，天子卷冕北面。”这“易”抱着龟卜，当然是指人。因此，郑玄注云：“易，官名。《周礼》曰太卜。”

(2) 认为“易”是变易的意思。孔颖达指出：“夫‘易’者，变化之总名，改换之殊称。”人们为了给这定义找寻根据，或说“易”的原义为蜥蜴，据称蜥蜴能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形状云云。或说“易”字从“日”从“月”，日上月下，日月相接，这意味着时间的变易。或说金文中的“龙”字，形状与“易”字相似，故“易”即龙。而龙，则擅于变化，这又和“易”为“变易”之说，拉上了关系。

这些解释，当然都可参考，但若说《周易》意为周朝的《易》，则值得怀疑。



我们知道,《易》的称谓,在周朝之前,早就有了。《周礼·春官》载:“太卜掌三易之法,一曰连山,二曰归藏,三曰周易。其经卦皆八,其别皆六十有四。”又《筮人》:“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。”因此,后来桓谭在《新论·正经》中又说:“易,一曰连山,二曰归藏,三曰周易。”可见,连山、归藏、周易,三者都是《易》。如果《周易》的“周”,是周朝的冠名,何以其他两“易”,不以其出现的时代冠名?须知“连山氏”(或烈山氏)只是一个人的姓氏,“归藏”甚至不见得是神农氏代指。所以,“因代以题”的说法并不确切,《周易》的“周”,也未必指周代。

其实,这三种“易”,作为占筮之书,从它们都有六十四卦的情况看,很有可能它们最初本来是同出一源。据王充说:“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,夏后因之曰连山;烈山氏之王得河图,殷人因之曰归藏;伏羲氏之王得河图,周人曰周易。其经卦皆六十四。”^①在王充看来,这三者,都出于河图,只是不同时代的人对它有不同称谓。又皇甫谧在《帝王世纪辑存》中又说:“庖牺氏作八卦,神农氏重之为六十四卦。黄帝、尧、舜引而申之,分为二易。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,殷人因黄帝曰归藏。文王广六十四卦,著九六之爻,谓之周易。”^②显然,皇甫谧也知道黄帝、尧舜引而申之者,也都是“易”,它们和《周易》一样,都源于庖牺、神农所编的“卦”。

如今,《连山》看不到了;《归藏》则在史籍中还留下一些痕迹。但它们都曾经在实际生活中流传。马国翰认为:“后汉时,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犹存。”(《玉函山房辑佚书·归藏序》)在宋代,李过还把《归藏》和《周易》作过比较,指出它们“卦名同者三之二,若屯、蒙、讼、师、比、畜、履,次序大略亦同。则文王重卦,只因商易之旧”(《西溪易说》)。这一切,

① 王充:《论衡·正说》,中华书局1954年版,第272页。

② 徐宗辑:《帝王世纪辑存》,中华书局1964年版,第8~9页。

说明了“易”，乃是这三部同一性质同一源流同一功能的典籍的总称。

关于“易”这一字，从商代到战国，在金文中使用率很高。蒙张振林教授相告，在金文里，“易”的常用义为赏赐。而赏赐，必有赐予方与接受方。因而在语法上，通常是以施予方为主语；若用于接受方，则为受事宾语，其后跟着是所受赐的事物。兹举数例为证：

公易旅贝十朋。（旅鼎）

王易金百孚，禽用作宝彝。（禽簋）

余易女车马戎兵，釐仆三百又五十家。（吊尸罍）

乍册麦易金于辟侯。（麦尊）

以上的“易”，即赏赐之义，用于施予方。而在铜器铭文的赅辞，也常使用“易”，例如：

见工敢对扬天子休……用易眉寿永年。（雁侯见工钟）

唯曾白文自乍宝簋，用易眉寿黄耇万年。（曾白文簋）

用追孝于其父母，用易永寿。（郭遣簋）

白内多父乍宝簋，用享于皇且文考，用易眉寿。（内白多父簋）

以上数例的“易”，则是祈求受赐的意思，所谓“用易眉寿”云云，即祈求获得长寿的保佑。^①

从“易”具有赐予和接受祈求的含义看，显然，从上古到战国，所谓“三易”，乃是三种用作施予和祈求亦即沟通上下的文本，巫者用“易”字来表明上天的指示和下民祈求上天的赐福，这完全符合“易”字的原义。换言之，“易”的初义，包含着交易、交换的意味。而在赐予和受赐的沟通关系中，赐予、施予的一方，包括上天或上级，自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主体。所以，𠄎（毛公鼎）、𠄎（孟鼎）、𠄎（克鼎）以及甲骨的𠄎、

① 参见张振林：《金文易义商兑》，载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4辑。



夬、𠄎、𠄎，那与“易”字下方的“勿”相应的符号，无不是从上向下倾斜，以示由上方向下施予；而下方则承顺上方的恩惠。可见，古文字的“易”，乃是由上而下相互沟通的意思。至于孔颖达释《周易》的“易”为变易，那是用“易”的引申义，反过来解释原义，这自然有不够确切之嫌。

既然《周易》之“周”，并非单指周代，“易”又非指“变易”，那么，它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我认为，被孔颖达否定的郑玄的解释，其实是可取的。他在《周易正义·序》引郑玄释“三易”之说云：“《连山》者，象山之出云，连连不绝；《归藏》者，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；《周易》者，言‘易’道周普，无所不备。”在郑玄看来，这三种“易”的得名，并非“因代以题”，而是表明它们编纂的重点。

据知，这三种《易》，其卦名编排的次序是不同的，宋代的朱震说：“商人作《归藏》首坤次乾；夏后氏作《连山》，首艮而乾已。其经卦皆六十有四。”（《汉上易传》卷六）夏人看重的是山，他们把连绵的山势作《易》之名，这是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心态的投影。而古人又把“艮”视为山的象征，朱震说夏人把“艮”作为首卦，以表明对山野的重视，应该是可信的。

朱震又说，《归藏》以“坤”卦为首，据《礼记·礼运》载：“孔子曰：‘吾欲观夏道，是故之杞，而不足征也，吾得夏时焉。我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征也，吾得坤乾焉。’”可见，孔子也看到过以“坤”为首卦的《归藏》。郑玄说：《归藏》乃是把万物收藏起来之义。在今天，我们虽然没有看到《归藏·坤》的内容，但《周易·坤》确写到“履霜”、“括囊”等与秋天收获的情景，以此推测，郑玄的判断应是合理的。由此，也可以说明夏人已完全进入农耕时代。

从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得名的情况看，古人取《周易》之名，也应是着眼于表明这书的内容、意义，才合乎逻辑，不可能唯独是它，才“因代”而“取题”。

郑玄说,《周易》的“周”,指的是“易道周普”。而周普,亦即指包括一切,“无所不备”的意思。按金文“周”作,《金文诂林》引张日昇云:“口象四周田界,其中阡陌纵横。𠄎象田中所植,田言种植之地,𠄎则指田周四至。”^① 所以,“周”的古义,是指周边包围了所有的事物。上文说过,“易”指自上而下的相互沟通,这一部传说是由周文王演绎的占筮之书,以《周易》命名,意在说明它涵盖了天地之间,天人之际相互统一的普遍真理。从《周易》对卦的编排看,首“乾”而次“坤”。乾象天,坤象地,这样的序列,确也有“乃统天”以及天地衔接的意味。

我认为,郑玄释“周易”为“易道周普”,似更符合《周易》命名的本义。在《周易》编纂者看来,他们所编纂的,乃是一部涵盖天人一切的占筮之书,因而以此意命名。这一来,它比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以某些意象命名的做法,显得更大气、更概括,更能从思想观念的角度,考虑自然和社会问题,也更清晰地表明它所具有的祈求上天赐佑的作用。

《周易》的卦和爻

《周易》,包括卦符、卦名、卦辞和爻辞。

何谓“卦”?按《说文》:“卦,筮也,从卜,圭声。”

“卦”,从“卜”,固然表明它有卜筮的功能,其实,用“圭”为声,也与占卜有关。因古人立土圭,测日影以此占问凶吉。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载:“以土圭之法测土深,正日景以求地中。”若日影长一尺五寸,就表明求得了“地中”,那么,“天地之所合也,四时之所友也,风雨之所会也,阴阳之所和

^① 蒋人杰编纂、刘锐审订:《说文解字集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,第268页。



也”，它是吉兆的预兆。《易·说卦传》也说：“古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……观变于阴阳而立卦。”可见，“圭”与“卜”合成而为“卦”，本来就是巫者和上天沟通的工具，后来，这卦字便用作筮卜的符号。

《周易》有六十四卦，就有六十四首卦辞，它是每卦内容的概括，也是巫者对此卦的总裁决。

《周易》每卦，都由三根爻符构成。“爻”字的本义，是烧炙甲骨或算筹交错所显示的纹理，古人观察纹、筹的交错变化，以此判断凶吉。后来也把它作为占卜的符号。

《周易》每卦的爻符，后面都附有文字。这些文字，被称为“爻辞”。

翻开《周易》，我们还会碰到两个符号：一为“—”；一为“--”。“—”被称为阳爻，“--”被称为阴爻。

多年前，我国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，在铜器铭文和甲骨文中，陆续发现了一批无法辨认的“奇字”。后来，经张政烺先生考证破解，原来这些“奇字”，是上古时代人们用以卜筮的数字卦符。“—”和“--”，乃是“奇字”的逐渐演化、简化，最后归纳为代表奇、偶的符号。^①

我们的祖先，把事物万象归纳为数，又区分为奇数、偶数，这说明人们已具备抽象思维的能力。古人认为，天地万象的本质，归纳为数，便是奇数“—”和偶数“--”的对立组合。而用于占筮，又把“—”称为“阳爻”，“--”则称为“阴爻”。这奇偶阴阳的合体，被称为一卦。他们又认识到，在奇偶阴阳的对立组合中，还存在一种不奇不偶亦阴亦阳的模糊渐变的状态。这状态，表现为数，形之于爻，便使一卦中包括了三个爻。古人把这三者的关系，比喻为“天、地、人”。如果把“阳”与“阴”比喻为天和地，那么，“人”是天地絪縕之气所

^① 参看张政烺：《试释周初青铜器中的易卦》，载《考古学报》1980年第4期。

生，居于天地之间而又能沟通天地的第三者。

古人还看到，由两极三爻组成的一卦，代表着某一事物的元素，是某一事物的本质和属性。而对待事物，古人已懂得应该立体地进行观察，于是发现把两极三爻的位置交换排列，便出现八种不同的组合方式，构成了八种不同形状的卦符。这便是所谓“八卦”。

传说“八卦”由庖牺氏发明制定，并给予八个卦名，即：

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


后来，人们为了便于记忆，编了首《八卦取象歌》：

乾三连 坤六断 震仰盂 艮覆碗
 离中虚 坎中满 兑上缺 巽下断

这八卦，人们把它视为八种事物的象征，或者视为八种属性，八个方向、季节等等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又认识到，事物的构成是复杂的，不会只有一个元素，于是把两个卦复合为一体，表示事物具有两元性，这就出现了“复卦”或称“重卦”。例如把“乾”卦放在上边，“兑”卦放在下边，便构成另一个新卦《履》；把“乾”卦放在上边，把“坤”卦放在下边，便构成另一个新卦《否》等等。人们把八个基本卦之间的位置相互交换，以“八”开平方，便得出六十四种排列组合，这就有了六十四卦。

传说把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的做法，在神农时代已经存在。“黄帝、尧舜引而申之，分为《二易》”，这说明不同年代不同部族的人，对这六十四卦有不同的排列次序，分成了两个系统。而我们今天看到的《周易》，则传说是由周文王构筑的新系统。

据司马迁说：“西伯……囚羑里，盖益《易》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又说：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”（《报任少卿书》）。又据《系辞下传》说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耶？当文王与纣之事耶？”究竟周文王是否是《周易》的编纂者，史无佐证。不过，《周易》作为不同于